

# 《開智錄》與粵語書寫： 維新時代的粵謳形式與知識經驗

高 嘉 謙\*

## 提 要

在清末的白話文運動裡，當標準的白話書面語未形塑完成以前，方言介入白話文運動是受到歡迎的。這不僅觸及到一套新興知識藉由方言口語與書面寫作，如何有效轉化為文學的表述，同時更深入到幾個跨境的廣府方言使用群體，他們在接收、傳播新知識的同時，如何生產和消費一套粵語的維新、革命話語，如何描述家國與境外移民社會生存空間，甚至形塑了粵語界面的民族想像與地方形式。

本文擬從清末民初的白話運動以降，觀察粵語書寫扮演的角色，以及粵語跨國流動的脈絡裡，粵語如何構成各地在接收新知識、新觀念過程，一個有效的表述載體和文體。粵謳是清末盛行於嶺南一帶的民間說唱文體。其在風月情調之外，亦有評鷺政治、響應新思潮的「新粵謳」寫作。1900年由馮自由、鄭貫公等人創刊於日本橫濱的《開智錄》，是最初刊載新粵謳的維新時代政論

---

本文於111.06.01收稿，112.03.15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DOI:10.6281/NTUCL.202303\_(80).0003

---

雜誌。我們藉此觀察彼時粵謳承載的維新視域，及其背後的知識結構。這樣的知識系統，如何連接於旅日維新報人、期刊的發行體系，尤其對於梁啟超《新小說》開闢「雜歌謠」欄目產生何種意義？這涉及粵謳背後可以探求的感知框架，包含對口語型態的捕捉和呈現，以及在時代語境下的情感政治。

**關鍵詞：**粵語、粵謳、方言、知識體系、文學表述

# ***The Wisdom Guide* and the Writing of Cantonese: Yueou, or Cantonese Folksongs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Reformist Movement**

Ko, Chia-Cian\*

## Abstract

Dialect was a welcome intervention in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time when standard written vernacular Chinese had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Dialectal involvement not only touched on how the emerging body of knowledge could be effectively translated into literary expression through dialectal diction and writing, but also reached out to several cross-border groups that spoke the dialect of Guangfu, Cantonese. As Cantonese speakers received and disseminated new knowledge, they produced and consumed a new,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Cantonese, described the social space of their home country and immigrants from abroad, and even shaped the national imagination and local forms of the Cantonese language interface.

In this article, we look at the role of Cantonese writing since the vernacular movement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how it constituted an effective vehicle and style of expression in the process of receiving new knowledge and concept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Folk song Yueou was a folk style of rap that flourish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Lingnan area. In addition to being popular among prostitutes and singers, new Yueou was also written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o comment on politics and respond to new trends.

*The Wisdom Guide*, founded in 1900 by Feng Ziyou, Zheng Guangong and others in Yokohama, Japan, was the first political magazine of the Restoration Era to publish new Yueou. Through this magazine, we can observe the vision of the Restoration that Yueou carried at that time, and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behind it. How did such a knowledge system relate to the publication system of Chines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Japan, and in particular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iscellaneous songs" section in the *New Novel* magazine founded by Liang Qichao? This involves the perceptual framework that can be explored behind Yueou, including the capture and representation of oral patterns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times.

**Keywords:** Cantonese, Yueou (Cantonese folk song), dialect, knowledge system, literary expression

# 《開智錄》與粵語書寫： 維新時代的粵謳形式與知識經驗<sup>\*</sup>

高 嘉 謙

## 一、知識體系與粵語書寫

在清末的白話文運動裡，當標準的白話書面語未形塑完成以前，方言介入白話文運動是受到歡迎的。其時知識界所謂：「不能不用各省之方言，以開各省之民智」，<sup>1</sup>在梁啟超（1873-1929）人等倡導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裡，方言俗語的寫作從來就不是禁忌。通行於嶺南地區的粵語，以口語和書面語的型態，透過各種文體的寫作實踐，在白話文運動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值得關注的是，粵語方言寫作，經由報人與文化人的跨境遷移，同時在晚清民初於嶺南、香港，以及日本、新馬一帶形成風潮。此時的粵語寫作，擔負著回應和傳播晚清保皇與革命思潮的各種知識、觀念和時局的評論。其透過民間的說唱、韻文體形式如粵謳、南音、龍舟歌等歌謠，同時包括格律詩，評論、小說、雜著等文體，廣泛描述和介入了一個時代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這不僅觸及一套新興知識藉由方言口語與書面寫作，如何有效轉化

---

\* 本篇論文初稿曾宣讀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的嶺南文化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再論近代嶺南文化與世界：物質文化、精神領域及情感結構」（2021年3月5-6日）。感謝本刊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使得本文更臻完善。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粵音與新聲：近代知識體系的方言書寫與跨境傳釋」（106-2410-H-002-211-MY3）部分成果之一。感謝計畫的博士後研究員鄭雅尹提供的協助。

<sup>1</sup> 見狄葆賢（楚卿）引梁啟超之言。楚卿：〈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新小說》第7號（1903年9月），頁5。

為文學的表述，同時更深入到幾個跨境的廣府方言使用群體，他們在接收、傳播新知識的同時，如何生產和消費一套粵語的維新、革命話語，如何描述家國與境外移民社會生存空間，甚至形塑了粵語界面的民族想像與地方形式。

在晚清白話文運動的脈絡，以北京官話為基礎的通用語，儘管是大量白話報刊的使用語言，但往往並非保留古音的南方方言世界，廣泛熟悉以及採用的語言表述方式。嶺南地區通行的粵語寫作，以其深入扎根於民間的語言特質，成為日常世界常見的表述文體。在啟蒙思潮興起的時刻，粵語書寫融入於報刊形式的新媒介，方言俗語受到歡迎而躍為文學進步之象徵，說明拉近言文一致的距離，是觀察粵語寫作的一個重要面向。粵方言的書面化，始自明末至民初而漸趨成熟。期間歷經明清木魚書、晚清聖經粵方言譯著，以及清末民初白話文運動的報刊粵語寫作三個重要階段。而粵語寫作，包含文白（粵）相雜的文體，以及粵方言白話體。前者取粵方言的口白特質，包括標準白話文雜糅粵方言詞句的變體，以及現代白話體內交夾粵方言口語的對話和語序。後者則是以粵方言口語寫成的語篇體。<sup>2</sup>關於粵語書寫的文體，往往涉及兩個面向。一是說唱形式的粵謳、木魚歌、龍舟歌等通俗的民間韻文體與歌謠。另一種是格律詩、諧文、小說、雜著。這是粵語書面化的現象，也是晚清粵語書寫值得關注的部分。

在李婉薇重要的研究著述《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sup>3</sup>，她提出觀察粵語書寫的兩個關鍵議題：聲音和文字書寫的相互影響，以及雅俗語言之間的調和滲透的可能。這是探討粵語書寫必然觸及的兩個面向，值得深究。李婉薇及相關同行的研究也做了部分的處理。然而在此之外，粵語書寫同時涉及知識的表現與承載。知識經驗的導入，影響粵音文體的表現，在粵腔口語裡的語序、用詞、情態的情緒傳遞與表述，理應是我們重新審視粵語書寫的重要特質。以粵

<sup>2</sup> 關於粵方言的書面化歷程，參見鄧小琴：《粵方言書面化及其歷史演變研究》（南京：南京大學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博士論文，2011年，顧黔先生指導）。

<sup>3</sup> 這是目前關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研究粵語書寫少見且重要的學術專著。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修訂版）》（香港：三聯書店，2017年）。

語傳遞知識，盛行於晚清時期。當時標榜粵語書寫的白話期刊，就有《廣東白話報》、《嶺南白話雜誌》，更遑論刊載粵語作品的其他刊物。粵語寫作的興盛，延續從明清以降的粵語書面語寫作的傳統。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晚清的粵語書寫跟白話運動連結起來，探究的問題就變得複雜。我們該嘗試理解，當方言口語與書面語結合的過程，這些模擬和回應口語節奏的書面寫作，混雜了粵人發明的獨特粵音方言字，其帶動通俗易懂的閱讀原則，如何重新表述所傳遞的知識新知？而流行的粵語書寫類型，又多屬通俗文學類型的粵謳、南音、諧文，在清末白話文運動中，這些方言口語與白話書面語的差異，如何拉近彼此距離，而構成承載維新知識話語，回應時代的救亡啟蒙思潮？換言之，粵語書寫跟白話文運動共享的界面，為我們開啟了一個思考語言形式與知識表述之間的核心問題。

嶺南是清末維新與革命思潮發源的根據地之一，又是眾多文化人與革命先驅渡洋跨境的起點。尤其戊戌變法以降，社會輸入、醞釀各種維新改良、開智啟蒙的思潮論述，政治姿態的保皇或革命，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的政治路線，無不指向時代變革的趨勢和方向。此時代精神不僅蓬勃發展於清帝國境內，亦隨著移民遷徙蔓延至日本、南洋、澳洲、美洲等華人移民社會。這種激烈變革、中西思潮相互交織激盪的時代氛圍，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近代中國境內與境外華人的精神結構，我們可將此一時期稱為「維新時代」。「維新」一詞，典出《詩經·大雅》，其體現的變革圖強的現代意涵，乃有近代日本對西方概念的轉譯、融入漢語的過程。<sup>4</sup>

事實上，從廣州開放通商港口以來，外來知識的入駐，傳教士辦報辦學，洋行分立帶動的商業繁華，民間禮儀、宗教、曲藝、文化習俗的蓬勃發展，以及混雜境外元素，都造就了嶺南粵語書寫發展的重要背景。在此前提下，粵語

<sup>4</sup> 以維新時代指稱清末民初追求啟蒙、新知，以及圖強變革的時代氛圍，也見於討論彼時文學抒情傳統展現的國體與個體在現代轉化的遭遇和體驗。見吳盛青、高嘉謙：〈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一個視域的形構〉，《揚子江評論》2011年第5期，頁18-31。

寫作從民間文體的發揚而起的半文半白特質，加上外來文明與時代變革思潮的激盪，很快就在書面語的成熟運用上，響應時代知識，傳播救亡圖存話語。粵語書寫與知識系統的結合，完成了有效率的傳遞。這是粵語書寫與白話運動接軌的前奏，替知識人建立起新的家國意識和認同。尤其配合維新派與革命派知識人辦報的影響，政論、社論、譯文，無不涉及時代知識，遍布政治話語，粵語書寫在此薰陶氛圍下成熟、擴展，成為一時的白話寫作先驅，鬆動了傳統漢詩寫作，改變了民間文體的格局。語言與知識的交接，介入時局的現實經驗，主導了種種知性與感性的表述。

在粵語書寫的版圖裡，展現的地域色彩，處處體現著知識調度與融攝。晚清黃遵憲（1848-1905）、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等「詩界革命派」詩人、保皇與革命陣營的政治大將，皆扎根於粵語流通的嶺南社會。語言背後無一不透顯著新學，以及知識範疇的統合和調整。晚清輸入與轉化生成的新知，往往涉及語言、詞語、概念的流變和傳播，這涉及知識人與群體大眾的接受、理解和實踐，可視其為一種知識經驗的觀察。其中知識的生成，又無法忽視翻譯、分科、制度的介入和作用，以及社會與政治內涵的注入，進而構成制約人們思維的知識範疇與系統。換言之，在西學影響與壓力下發生的知識與制度轉變，近代中國被動參與的國際局勢與地緣政治，打開了新的知識視野和結構。論者提醒我們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就是一個「新名詞」到「關鍵詞」走入人們知識結構與日常用語裡的過程，其反映的是現代性物質文明成果、制度及其實踐、現代學科知識和術語，以及作為現代性核心的某些價值（如自由、科學、人權）等等。<sup>5</sup> 在此背景下，我們關注在文體與思想變革的時代，應該如何思考粵語寫作，那兼具口語、通俗，以及書面演說表述的語言形式，對於知識經驗的接收與傳遞？粵語書寫投映的知識視野，為我們開啟了怎樣的文學史格局，以及文化生產的新樣態？這是我們釐清與探究近代「『知識』經驗」表述的重要面向。

<sup>5</sup> 潘光哲：〈從「新名詞」到「關鍵詞」專輯引言〉，《東亞觀念史集刊》第2期（2021年6月），頁83-88。



## 二、《開智錄》的粵謳「情感」與知識「經驗」

1900年馮自由（1882-1958）、<sup>6</sup>鄭貫公（1880-1906）、<sup>7</sup>馮斯樂<sup>8</sup>於日本

- <sup>6</sup> 原名懋龍，字建華，後改名自由。號海桴，別署攀龍、乘桴客、白頭說夢人。廣東南海（今廣州）人。生於日本橫濱，幼年回國求學。回橫濱後，1895年加入興中會。1897年入橫濱華僑大同學校，1899年轉入東京高等大同學校，次年升入東京專科學校（後改名早稻田大學）政治科。除了參與創辦《開智錄》半月刊，1901年與馮元丞、秦力山等人在東京創辦《國民報》。1903年任香港《中國日報》和舊金山《大同日報》駐日記者。1905年參加中國同盟會，旋赴香港組織分會，任書記兼《中國日報》記者，後擔任社長兼總編輯。1910年赴加拿大及美國，聯絡華僑為革命籌款，期間主持溫哥華《大漢日報》筆政，任《新民國晨報》主編。1936年後主要從事辛亥革命史編撰工作。1948年遷居香港，1951年定居臺灣，任國民黨總統府國策顧問，並纂修國民黨中央黨史會。1958年病逝於臺北。相關生平資料，可參見陳海懿、張雅婷：《孫中山與馮自由》（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 <sup>7</sup> 原名道，字貫一，後改貫公。號自立，筆名仍舊。廣東香山（今中山）人。16歲東渡日本，1899年受薦入東京大同高校就讀。1900年冬，任《清議報》助理編輯，同年加入興中會，創辦《開智錄》半月刊。因公開反滿的言論，1901年被《清議報》解職，經由孫中山薦充香港《中國日報》記者，名聲漸起。1903年離開《中國日報》，1904年1月與林護、譚民三、崔通約等創辦《世界公益報》，後辭去主編職務。同年3月創辦《廣東日報》，任總編輯兼督印人，後轉由李漢生接辦。1905年創辦革命小報《有所謂報》，任總編輯兼發行人。是年7月同盟會香港分會成立，被選為庶務幹事。翌年病逝香港。相關生平資料，可參見馮自由：〈革命逸史：鄭貫公事略〉，《逸經》第25期（1937年3月），頁30-31。楊國雄：〈鄭貫公：英年早逝的革命報人〉，《香港戰前報業》（香港：三聯書店，2013年），頁66-111。
- <sup>8</sup> 生卒年不詳，字樂天，號慕民，別署自強氏。廣東鶴山（今高鶴）人。早年參加興中會，留學日本東京高等大學。1900年與鄭貫一、馮自由共同創辦《開智錄》半月刊。1901年因國外報紙刊載清廷割讓廣東予法國之說，同旅日粵籍學生鄭貫一、馮懋龍、李自重、王寵惠等發起廣東獨立協會，得孫中山及興中會會員贊助，開粵籍留日學生與興中會合作之始。歸國後，易名貢世。生平資料並不齊全，主要從各類資料裡拼湊其簡要生平經歷。

橫濱創辦《開智錄》，是中國留日學生最早創辦的刊物之一。<sup>9</sup>三人都籍貫廣東，其中馮自由是橫濱出生，其餘二人乃留學日本，他們皆為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該刊物最初於1900年11月油印出版，半月刊，屬三人成立橫濱「開智會」的機關報，也稱「開智會錄」，於該年12月出版改良版第一期（鉛印），至1901年3月第六期停刊。由於創辦人馮自由的父親馮鏡如（1844?-1913）實為《清議報》名義上的總經理，有經營實權，而鄭貫公為《清議報》的助理編輯，故《開智錄》藉助《清議報》為印刷和發行平台，因此有《清議報》銷售的地方就有代售《開智錄》，每期約500份，以「文字淺顯、立論新奇」廣泛走入了華僑社會。<sup>10</sup>《開智錄》最大的特點除了倡自由之言論，同時提倡君主立憲，後期言論又提出推翻清朝統治之口號，展示了年輕留日學生在保皇與革命立場之間的變換，凸出他們面對國家議題處在思想十字路口的狀態。<sup>11</sup>但蔡鏗替開智會撰寫的序文，張揚了鄭貫公等人的抱負：

國民有一分之智，即能握一分之權……爭權之道，必在充足吾國民智力也。智力既充，則雖一時瓜分，不能絕吾國民之華盛頓也。片時受兩層奴隸之辱，不能使吾民之自由鐘息聲也。<sup>12</sup>

開智和爭權，相互因果，這是創辦《開智錄》的底蘊，卻也揭示了這群年輕的留日學子在維新時代實踐愛國救亡思維的策略。

彼時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橫濱，受到當地英籍華人馮鏡如、馮紫珊（?-1921）

<sup>9</sup> 《開智錄》的相關資訊，早期見於馮自由的著作，但學界並未看過該期刊之全貌。至到1984年寧樹藩發現《開智錄》改良版六期，撰述專文介紹評述，並由陳匡時、寧樹藩整理校點，將改良版六期內容登載於復旦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四、五輯，1987年），學界才開啟了研究論述。參見寧樹藩：〈橫濱《開智錄》評介〉，《新聞大學》1984年第1期，頁89-91。

<sup>10</sup> 馮自由：〈革命逸史：橫濱開智錄〉，《逸經》第6期（1936年5月），頁32。陳海懿、張雅婷：《孫中山與馮自由》，頁30。

<sup>11</sup> 寧樹藩、陳匡時：〈評《開智錄》〉，《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3期，頁22-28。周佳榮：《瀛洲華聲：日本中文報刊一百五十年史》（香港：三聯書店，2020年），頁48。

<sup>12</sup> 奮翮生：〈開智會序〉，《開智錄》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2日），頁1b。

兄弟支持，他們擁有印刷廠，促成橫濱與東京成為晚清華人政治新聞、新知傳播的重鎮。1899年梁啟超創辦《清議報》作為保皇派機關報，以倡民權、衍哲理、明朝局、厲國恥為其特色。<sup>13</sup>然而，康有為對《清議報》的文字頗多干涉，對登載自由、平等、獨立、自主等名詞詰責，康梁之間的理念與關係也開始分歧和矛盾。<sup>14</sup>其時鄭貫公、馮自由等人的政治立場與保皇會漸有距離，他們尤其倡導爭「自由發言之權」、「輸進新思想」、「鼓盪國民獨立之精神」，<sup>15</sup>故創辦《開智錄》既為落實「開民智」的宗旨，也為發揮平等自由天賦人權真理。如此一來，鄭貫一原號貫厂，易「厂」為「公」，號自立；馮斯樂號自強，再加上本名馮懋龍改名馮自由，人稱「三自」，既有脫離康門範圍之宣示，亦顯現他們從維新改良逐步轉向反清革命的思想。

他們在強調國家維新、新民社會之餘，往往調動不少民間形式作為倡導新思想、新知識的文體。其時《開智錄》設置的欄目共有「本會論說」、「言論自由錄」、「雜文」、「譯書」、「偉人小說」、「詞林」、「時事笑譚」和「粵謳解心」等。其中屬於粵語文體的粵謳或南音，每期固定刊載。這些粵語書寫均涉及種種開民智、倡維新的思潮導引，以及背後傳遞的知識概念。1902年11月梁啟超於橫濱創刊的《新小說》，開闢「雜歌謠」欄目，在宣傳自由、平權、新國民之餘，「雜歌謠」乃考量刊載民間韻文體，諸如民歌、粵謳、彈詞、竹枝詞等可經拉近群眾距離的效果，貼近眼前事物，完成傳播新知識概念的功能。這自然可追溯梁啟超〈論幼學〉（1896）強調取各種學問，編歌訣書，「令學子自幼諷誦，明其所以然，則人心自新，人才自起，國未有不強者也」。這以韻語、歌謠為啟蒙文體的構想，凸顯了他自言從廣東南音獲得的靈感。<sup>16</sup>與

<sup>13</sup> 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100冊（1901年12月22日），頁5b。

<sup>14</sup> 簡又文：〈馮自由易名之由來〉，收入簡又文等著：《〈逸經〉文史集粹》（臺北：新銳文創，2021年），頁100-101。

<sup>15</sup> 〈開智會錄緣起〉，《開智錄》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2日），頁2b。

<sup>16</sup> 梁啟超：〈論幼學〉，《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冊，頁38。

此同時，他也在回應黃遵憲的建議：「斟酌於彈詞粵謳之間……易樂府之名而曰雜歌謠，棄史籍而采近事」，<sup>17</sup>或二人以民間俗語方言倡導啟蒙的立場相近。如此既呼應了詩界革命倡導俗言俚語入詩，帶動古典詩語和格式的改變，也無形中帶動了方言書寫的實踐風潮，間接呈現方言寫作對家國現況的描述，以及展開的知識想像。依此脈絡觀之，鄭貫公等三位粵籍青年學子藉《清議報》平台發行的《開智錄》，更早開啟了粵語文體傳播維新、革命思想，引領風氣之先。這不妨視為梁啟超爾後在《新小說》支持與鼓勵方言書寫的前沿，當然具有開創的意義。《開智錄》大概是粵謳最早接軌和發揚維新思想的刊物，恰恰是 1859 年日本開放自由貿易以後，作為通商口岸的橫濱聚集最多的粵籍華人，<sup>18</sup>促成了粵謳的寫作、閱讀和傳播的語境。

綜觀《開智錄》改良版的六期目錄，第一、二各期均有 3 首粵謳，第五期則有 2 首粵謳，總共 8 首粵謳都緊扣開民智、爭民權的精神內涵。另外，有一首南音接續刊載於第三、四期，第六期終刊號則有未能完整刊載的南音一首。這就是《開智錄》調動粵語民間形式的全貌。儘管粵謳數量不多，最值得細究的，當屬在維新與革命派聚集的海外活動據點橫濱，這些粵謳或南音的粵語書寫，如何有效投映和轉化一套知識視野。

李婉薇指出《開智錄》「『時事笑譚』和『粵謳解心』的設置，前者仿筆記體式，以嘻笑怒罵的方式抨擊官員的怯懦和腐敗；後者以民間說唱形式，表達憂傷國事的情懷」，<sup>19</sup>基本道出這兩個專欄發揮的敘事功能。然而，若從知識經驗的承載與傳遞而言，「粵謳解心」另有更積極的功能值得注意。

<sup>17</sup> 參見黃遵憲 1902 年 9 月 23 日致梁啟超函。黃遵憲：〈致梁啟超函〉，收入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432。

<sup>18</sup> 橫濱的華人移民社群的形成與擴張，在 19 世紀末最為顯著。當地有被稱為「南京町」的中華街，1880 年橫濱市的華人佔全日本華人總數的 69.2%，到了 1911 年，橫濱市是日本華人最多的城市。由於廣東跟歐美、南洋的商貿接觸最早，橫濱因貿易之故也聚集最多的廣東籍華人。參見韓清安：《橫濱中華街（1894-1972）：一個華人社區的興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 年），頁 27-32。

<sup>19</sup> 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頁 68。

粵謳，亦稱粵謳解心，最初興盛於清中葉，流行於妓女、歌女之間，跟木魚歌、南音、龍舟同屬歌謠系統。這些生成於珠江花艇的民間樂調詞曲，經文人化的融會加工，集合多種民間說唱文學，新聲別創。這一粵語方言寫成的說唱文體，可清歌，或以琵琶伴唱，最初集結流傳的文獻始於招子庸（銘山，1793-1846）《粵謳》（1828）一書。招子庸是嘉慶丙子科舉人，文人投入民間韻文體的寫作，語言趨文雅，曲調亦嚴謹，粵謳廣受歡迎，流傳於嶺南地區，成了雅俗共賞的樂曲形式。爾後另有晉陽先生撰《再粵謳》（1830）、<sup>20</sup> 香迷子輯錄《再粵謳》（1890），珠海夢餘生《新粵謳解心》（1924）等出版。<sup>21</sup> 港督金文泰於1904年甚至將《粵謳》翻譯為英文本 *Cantonese Love Songs*，推介到英語世界。<sup>22</sup> 這凸顯了粵謳的民間風格，帶來的魅力和想像，也印證了民間歌謠作為改造資源的文體活力。其時，新加坡流寓文人邱菽園（1874-1941）曾就粵謳的曲調概括為：

淒音緊韻，同于秦聲，而無其鄙。哀思逸趣，媿於崑曲，而節其勞，雅志未忘，鄭聲不亂，識者方以元詞北曲而后，能開一代生面推之，此言允矣。<sup>23</sup>

<sup>20</sup> 此版本較為少人提及。晉陽先生撰：《再粵謳》（清道光十年廣州蘭經堂刻本），收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海外廣東珍本文獻叢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輯第37冊，頁251-410。

<sup>21</sup> 粵謳歷來研究成果不少，討論招子庸，或說馮詢、王準是「粵謳」創始人，皆無定論。而招子庸是《粵謳》作者、輯錄者或編著者，也有不同說法。但全書風格統一，招氏是《粵謳》作者應較可信。重要研究成果參見陳寂：〈前言〉，收入招子庸著，陳寂評注：《粵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11。梁鑾江：〈論招子庸的《粵謳》〉，收入紀德君、曾大興主編：《廣府文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卷，頁2-9。《廣府文化》第2卷設有「招子庸及《粵謳》研究」專輯，內有多篇研究論文可供參考。最新研究成果，參見朱少璋：〈鳩舌蠻音話粵謳〉，收入朱少璋編校：《粵謳采輯》（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3-39。

<sup>22</sup> 相關研究可參考姚達兌：〈《粵謳》的英譯、接受和敘事〉，《文化遺產》2011年第3期，頁66-73。

<sup>23</sup> 邱焯菱：《揮塵拾遺》（上海：星洲觀演齋叢書，1901年），卷一，頁1。

這是粵謳的基本文體特色，以抒情哀婉見長。

然而，粵謳在風月情調以外，亦有其貼近現實，模擬和抒發現實不滿的書寫取向。未署名而流傳下來的「燕喜堂鈔本」35首粵謳，不乏鴉片戰爭期間的現實批判，帶有政治諷刺和譴責，揭示粵謳創作可以另有懷抱。<sup>24</sup>但直到1902年梁啟超在日本創辦《新小說》的「雜歌謠」專欄刊載粵謳，才形成系列響應新民思潮，宣揚新興理念的「新粵謳」。粵謳由抨擊政治、刻畫底層人物生活，往外擴大其敘事能量，而多了家國、時事，以及知識視域的建構。這是粵謳跨境形塑的時代新貌，投映了中國留日學生、士人調動民間韻文體，寄寓著藉民間歌謠改造詩語，或重啟民間形式，投入時代寫作，響應啟蒙救亡的意圖。

1900年2月梁啟超於《清議報》發表〈汗漫錄〉，高呼詩界革命，倡導詩體革新。該報的「詩文辭隨錄」和1902年創辦《新民叢報》的「詩界潮音集」是主要陣地。無法忽視的是，在詩體改革之際，粵語民間韻文體的改造也在進行。《開智錄》刊載的8首粵謳和2首南音首開先聲，爾後才有《新小說》「雜歌謠」刊載歌謠體的通俗詩，響應時代新聲。晚清外交官廖恩燾（1864-1954）以未署名，或署名珠海餘夢生或外江佬創作系列22首的「新粵謳」於「雜歌謠」登場，已是1903-04年間，接著1905年發表的幾首粵謳，《新小說》發行地已轉往上海。如此說來，1900-1901年間《開智錄》刊載的粵謳，雖無署名作者，大概可以推想是鄭貫公等人的作品。這些在日本語境刊載、傳播的粵語書寫，可看做新粵謳最早刊印發行的起點，接續傳播至南洋、澳洲、北美等華僑社會而帶動新粵謳寫作。

《開智錄》出版改良版六期後，被指控與保皇會宗旨不符，《清議報》終止了鄭貫公編輯之職，且禁止《開智錄》藉《清議報》平台印刷，於是被迫停刊，<sup>25</sup>鄭貫公遂離日轉往香港革命派報刊《中國日報》主筆政，另主編該報副

<sup>24</sup> 冼玉清：〈粵謳與晚清政治〉，《冼玉清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287-382。

<sup>25</sup> 馮自由：〈革命逸史：橫濱開智錄〉，頁32。

刊「鼓吹錄」，增設以「諧文」、「粵謳」、「南音」、「詞苑」等欄目，開粵語入文之先河，為中國報刊設置歌謠、諧文之濫觴。<sup>26</sup> 1905年創辦《唯一趣報有所謂》（1905-1906），大力落實「用通俗文藝來傳播革命思想和開啟民智」，<sup>27</sup> 是粵謳盛行時期的代表性報刊。他清楚揭示寫作新粵謳作為「開智之道」的積極意義：

謳歌戲本不能不多撰也。開智之道，開上等社會易，開下流社會難。報紙為開智之良劑；而謳歌戲本，為開下流社會智識之聖樂，故邇來報界漸次進化，皆知謳歌戲本，為開一般社會智慧之不二法門，樂為撰作。<sup>28</sup>

經過廿餘年的書寫和傳播，新粵謳的寫作相應成熟蓬勃。1924年廖恩燾刊印《新粵謳解心》，風靡一時自然可以理解。在白話新文學當道的年代，廖恩燾延續梁啟超、鄭貫公早期言論，強調方言俗語的傳播力量，以期「聲入心通」：

願一省有一省方言，音別義異，以云普及，戛戛獨難；則惟有出於各藉其土音以為誘掖之一道。然而為下流社會說法，又非擇其平日口頭慣語，衍為有韻之文，未易使聲入心通。瞿然感覺，三百篇不失風人之旨，豈不由於採及里巷歌謠哉。<sup>29</sup>

在民初倡導白話文的潮流裡，《新粵謳解心》面世，等於再次重申了粵語寫作特質。換言之，1900年創刊的《開智錄》設置粵謳欄目，揭開了一個中原境外，充滿活力的粵語寫作現場，初步實驗方言說唱書寫如何體現其「『知識』經驗」的轉換，以及作為各地華僑社會最初文學場的一種表現形式。

<sup>26</sup> 楊國雄：〈鄭貫公：英年早逝的革命報人〉，《香港戰前報業》（香港：三聯書店，2013年），頁71。

<sup>27</sup> 貫公：〈開智社有所謂出世之使聲〉，《唯一趣報有所謂》（1905年6月4日）。轉引自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頁70。

<sup>28</sup> 貫公：〈拒約必須急設機關日報〉，《唯一趣報有所謂》（1905年8月18日）。轉引自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頁70-71。

<sup>29</sup> 廖鳳舒：〈自序〉，《新粵謳解心》（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1年），頁36。

### （一）粵謳激盪的民族主義：國民與民權

新粵謳興盛於清末民初，跟近代新派詩、新文體、新小說一樣，展露其文體嶄新的一面，其「新」在於具有啟蒙、平民和地方性特質。<sup>30</sup>但新粵謳寫作的起點，更值得關注其交織而成的知識氛圍，尤其橫濱在地華人社群、留日學生、政治人物在政治語境裡，如何共享一套知識體系，在不同文體的寫作謀其出路。

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橫濱當地華人的民族意識受到激盪，日本具有泛亞洲主義思想的政治人物如犬養毅（1855-1932）、大隈重信（1838-1922），冒險家宮崎滔天（1871-1922）、日本儒學家山本憲等對中國政治流亡者多有接應，孫中山（1866-1925）、康有為、梁啟超三人先後來到橫濱，同屬晚清最具影響力的知識與政治領袖，皆有嶺南背景，他們透過出版與教育，推動政治活動，培養當地華人的種族認同與國民意識。然而，孫中山的排滿革命，與康梁的維新改良與君主立憲激烈對立，橫濱華人社群因此成了流亡民族主義交鋒的戰場。其中 1898 年康梁對橫濱大同學校的建設與改造，借鑑日本教育模式，康有為的學生徐勤成為該校校長。馮自由是第一批入學的學生，根據他的回憶，大同學校帶入覺悟國恥、救國思想的教育方針，採〈戊戌政變記〉、康梁詩集為教材。隔年梁啟超跟橫濱僑商募款，在東京成立高等大同學校。<sup>31</sup>康梁對教育的積極作為，相當程度催生了橫濱華人現代民族意識與愛國思想。然而，他們推行新學教育之際，卻也有孔教振興思維。因而當地華人基督徒對孔教之反感，孫中山革命派支持者對學校控制權的爭奪，複雜化了橫濱華人社群的派系與民族分裂。與此同時，1899 年橫濱廣東華人菁英向日本政府發起請願運動，

<sup>30</sup> 陳方：〈論「新粵謳」〉，《周口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9 卷第 1 期（2002 年 1 月），頁 35-39。

<sup>31</sup> 關於馮自由的回憶，見馮自由：〈革命逸史：橫濱大同學校〉，《逸經》第 3 期（1936 年 4 月），頁 39-40。



保障了華人在日本內地雜居的權利，進一步將橫濱華人凝聚為一民族共同體。由此強化了橫濱華人的政治意識，以及跟中國的政治聯繫。<sup>32</sup>

馮自由、鄭貫公等人皆出自大同學校之栽培。而大同學校的過半學生都有中日混血身份。<sup>33</sup> 從地緣意義而言，大同學校扎根於橫濱和東京，又屬中日民間合作的成果，不僅帶動了儒學／孔教的跨國實踐與想像，且在彼時中日同文同種的流行思潮下，灌輸著帝國主義下共同受害者意識，民族的救亡圖存，同時帶有反帝國主義和革命意識。<sup>34</sup> 大同學校的學生多有參與革命組織和刊物的經歷。因而從廣東的政治流亡領袖在橫濱的出版與教育運作來看，他們譯介與播撒政治、社會學說和文明思想，卻同時推動帶有粵音地方色彩的粵謳與南音點綴其中，在嚴肅學理的傳播之外，另探求激盪人心、帶動情感的民間寫作形式。這類接應民族主義情緒和新興思潮的新粵謳寫作冒現於橫濱，其實體現著一種遠距民族主義（Long-Distance Nationalism）<sup>35</sup> 與地方認同的操作。

據此回顧《開智錄》改良版六期的內容，可以發現「粵謳解心」的設置，往往搭配彼時政治思想、自由言論的表達，以及時局憂患而觀。諸如第一期「言

<sup>32</sup> 關於 1895-1911 年橫濱華人區的雜居地政治氛圍，參見韓清安：《橫濱中華街（1894-1972）：一個華人社區的興起》，第二章，頁 57-89。

<sup>33</sup> 馮自由在提及他的橫濱大同學校同學蘇曼殊為中日混血兒之際，注意到班上有過半同學都舉手承認「相子」（Ainoko，混血兒）身份。參見馮自由：〈蘇曼殊之真面目〉，《革命逸史（初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39 年），頁 166。

<sup>34</sup> 史峻：〈清末的中日合作：日本橫濱大同學校為研究對象〉，收入江寶釵、王德威主編：《第 11 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論文集：域外經驗與中國文學史的重構》（臺北：文水出版社，2017 年），頁 243。

<sup>35</sup> 遠距民族主義的概念，可見於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及其後續著作。這個概念對於描述離散與移居者的民族主義有其重要意義。此處指稱透過現代印刷媒介和生產技術的傳播，新時代的通訊革命改變了遠距離的人們的主觀體驗，他們得以廣泛接觸到相同的文化訊息而產生民族認同和共鳴。此概念的詳盡討論可見（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甘會斌譯：《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年），頁 72-93。

論自由錄」開宗明義就是新思潮與新知識的倡導。無論是〈勢吞地球〉、〈革命之劍〉，「譯著」的〈自由略論〉、〈法國革命史〉、「詞林」的〈政變後有感三首〉、〈義和團序〉，呈現了各式維新情懷與知識。「粵謳解心」首期刊出〈心點樣解〉、〈憂到冇了〉、〈無可奈〉三首，表面是抒情筆調，訴諸家亡國破的情緒。但詠歎彈唱之間，粵語口語的俚俗易懂，表達了救亡圖存的焦慮。尤其背後負載的知識能量，值得我們細讀。

#### 心點樣解

心點樣解，唱幾枝歌。局勢如斯喚奈何，細想今日的淒涼究竟係誰之錯。國民心死呀！枉費你有四萬萬咁多！壓力重重來壓我，點解賤似泥沙任佢折磨。若係壓得太深，就要發憤共佢來爭過，奪返民權免被佢亂苛。倘或甘心在此來居坐，恐怕外憂內亂呀，更弊過地網天羅！勸君免受無窮禍。哎！須要想過，切莫牢不破，等到盤穿鉢破箇陣呀，就怨恨當初。<sup>36</sup>

這首粵謳著眼兩個核心觀念：「國民」和「民權」。而「國民」一詞，固然非晚清時期所創新詞，<sup>37</sup>但世紀之交的此刻，「國民」一詞相對政治維新改良時期強調開辦學校，「教所以為國民，以為己國之用」的「鼓蕩國民，振勵維新」<sup>38</sup>已有不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以及其時留日知識分子歷經西學翻譯的激盪，重新鑄造的國民論述，在晚清思想界帶來的巨大影響和效應已不可同日而語。在 1899 年，梁啟超代表性的國民論述〈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完整揭示了國民新定義：

<sup>36</sup> 《開智錄》改良第 1 期（1900 年 12 月 22 日），頁 7a。

<sup>37</sup> 晚近研究指出，「國民」已見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且賦予這一古漢語複合詞以新義，與彼時西方現代「公民」（citizen）一詞已有相近之處。方維規：〈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及相關核心概念通考：兼釋「中國」與民族主義論爭〉，收入孫江、陳力衛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 2 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年），頁 31-32。

<sup>38</sup> 康有為：〈請開學校折〉，收入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上冊，頁 305-307。

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sup>39</sup>

其時知識分子對國民概念展開提問，強調「作為國家主體，人人有權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現代公民」。<sup>40</sup> 故〈心點樣解〉此時設置的敘事脈絡，恰恰落在「國民」要「奪返民權」憂憤的情感狀態。粵謳標題探問「心」有何解？解惑，還是排憂？但現實景況是：「壓力重重來壓我，點解賤似泥沙任佢折磨」。這裡潛在代換了國民論述的論證邏輯，奴隸與國民往往是並提相稱的論述語序。《清議報》主編麥孟華於1901年初發表〈說奴隸〉，率先張揚「國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獨立之性質」，而中國是「父訓其子、兄詔其弟、師教其徒、友勸其朋，無不以奴隸為宗旨」，造就「舉其國為奴隸之國，而外人遂以有奴隸性質唾賤我四萬萬之人」。<sup>41</sup> 奴隸即是國民狀況，這是清末國民性批判或奴隸性批判熱潮裡，奴隸和亡國奴互為表裡的認知。<sup>42</sup> 這也就不難理解，粵謳以口語的率直批判「重重來壓我」、「賤似泥沙」，直抒胸臆而暴露「國民」的生存狀態，據此合理化「國民心死呀，枉費你有四萬萬咁多」的召喚和調動「國民」情感的策略。但作者直探核心的是心如何解，藉此召喚「國民心」，而解決之道則在於「發憤共佢來爭過」和「奪返民權」。民權概念不是想當然爾，在《開智錄》鋪展的知識脈絡裡，不乏翻譯日本作者對於自由、民權的著作。馮自由翻譯大井憲太郎〈自由略論〉，譯者按語就言明：「播種自由平等之新

<sup>39</sup> 哀時客：〈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清議報》第30期（光緒25年9月11日，1899年10月15日），頁1a。

<sup>40</sup> 關於清末國民論述的建構，參見沈松橋：〈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2002年12月），頁685-734。

<sup>41</sup> 傷心人（麥孟華）：〈說奴隸〉，《清議報》第69期（光緒26年11月21日，1901年1月11日），頁1b-2a。

<sup>42</sup> 國民性與奴隸論述的連結，參見沈松橋：〈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頁694-700。

主義，以一變社會之思想。其法如何？演說、著書、開報，其大旨也」，強調「人之在覆載間，誰不有自由者乎？自由者天賦固有之性，與誕生而俱來」。<sup>43</sup>

作為召喚國民的勸誡之作，作者設置的情感線條，頗能體現說唱文體表現情感的俐落和活潑。其透過口語式反向或負面情緒的詰問：點樣解、枉費、點解賤似、倘或甘心，進而揭露最壞的狀況：「更弊過地網天羅」、「等到盤穿鉢破」，營造情感導向的訴求，達到「奪返民權」的呼籲。換言之，粵謳無意展現複雜的民權觀念或國民意識。但藉由國民被奴化的描述，基本已在為其時鼓動的新國民論述，建立一套情感框架的表述。透過擅於表現情感狀態的口語、俗語寫作，讀者很難不注意到，粵謳背後承載的是一套國民論述。

而同年馮自由在《開智錄》停刊後，另外創辦《國民報》暢談國民說：

今日之中國報館有禁出版，有禁立會演說，又有禁倡公理而目為邪說，開民智則誣為惑人。坐是種種而中國國民之種子絕，即中國人求為國民之心死。<sup>44</sup>

「中國人求為國民之心死」，這跟〈心點樣解〉底蘊相輝映的言論，與其說粵謳僅是對時局抒發憂憤之作，我們更應該正視在國民論述、民權觀念進駐的時刻，知識分子藉由粵謳搭配論述形成的報刊脈絡，試圖傳遞的新觀念和訊息。在1901年3月最後一期出刊的《開智錄》，就刊載未完稿的南音〈國民嘆五更〉。<sup>45</sup>「國民」躍然紙上，以「虧我中華染種危亡病，氣色淹淹與鬼鄰」開篇破題，接續直抒胸臆，鼓吹新聲：「只有國民當要齊發憤，大倡改革自立維新。民主共和行善政，免使外人欺我賤過泥塵。」顯然當時的言論新知已嫻熟調度於粵謳和南音這類粵語寫作。新興知識環環相扣，粵謳說唱文體可視為知識交織的組成部份，在粵腔裡透過俚俗語感和趣味，進行著知識經驗的轉換。

<sup>43</sup> (日)大井憲太郎著，馮懋龍自由氏譯述：〈自由略論〉，《開智錄》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2日），頁3b。

<sup>44</sup> 〈說國民〉，《國民報》第1卷第2期（1901年2月），頁8。

<sup>45</sup> 《開智錄》改良第6期（1901年3月20日），頁6a。由於該期為《開智錄》停刊最後一期，〈國民嘆五更〉未能刊完，故本文僅就片段討論。

這恰恰也回應了時人為何以辦報作為開民智的要點，作為「聲音的政治」的一環，報刊雜誌裡的粵謳巧妙地扮演著一定的角色。

## （二）粵腔裡的家國：粵謳的情感政治

維新時代的各種追求平等、自由、民權的話語裡，新粵謳型態的出現，明顯擔負著時代情感訴求的功能。然而，透過粵腔俗語貼近的現實，各種時局的情感模擬，其實不妨視為一種「維新」情感模式（emotional modes）<sup>46</sup>的投射。《開智錄》的三位創辦人當時不過是未滿和接近 20 歲的青年，透過報刊雜誌強調民權、自由、天賦人權等近代新興觀念和價值，粵謳的寫作，被導入用以表現這種面對知識和時局的情感狀態。換言之，我們不妨說在粵謳的粵腔俗語裡，模擬著一種「維新」青年的情感政治（emotional politics），那指涉轉折時代集體情感的文化政治內涵，探求怎樣的知識概念、語言符號、群體氛圍，主導著他們的情感與價值。他們的情緒和時代感覺除了「點解」，還有集合負面情感的有了、無奈、愁、怨等情態。這固然跟粵謳的傳統文體和音樂調性有關，但也說明了粵謳正以一種情感框架去捕捉和承載因應知識衝擊帶來的經驗轉變。

以下這首粵謳將燈擬人化，以其獨立光明，對照國民群體的沉睡未醒或裝不知。

憂到有了

憂到有了，對住孤燈。燈呀！做乜你獨立光明咁可人！眾生醉夢未知何時醒，家亡國破呀！佢都詐作唔聞！怎能學得燈你呢種光明正，把佢地一一分明革舊鼎新。虧我飄流四海誰尋問？地角天涯好似賣身。政府

<sup>46</sup> 西方情感理論對情感模式的哲學性思考，涉及從心理學現象，如信念、欲望、感知等來認識情感模式。這是透過情感與感覺的對比來形塑、理解情感模式在情感的作用。Fabrice Teroni, "In Pursuit of Emotional Modes: The Philosophy of Emotion after James," in Alix Cohen & Robert Stern, eds., *Thinking about the emotions: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91-313.

係咁樣子欺凌須要同發憤。大家合力就可眾志成城，若不擊暴除奸我輩斷斷難安穩。哎！當猛省，未渴先開井，莫等到大禍臨頭箇陣呀，就魄散魂驚。<sup>47</sup>

這類似清末言論裡的睡獅論述，或描述庚子事變，八國聯軍入京之際，南方各省依然是太平時局、冷眼旁觀的局外人現況投映。「家亡國破」而「飄流四海」、「地角天涯」，唱詞裡的賣身之感，恰恰是同屬離散狀態的留日學子，最能看破世局的關鍵。故作者要學燈來「革舊鼎新」，更積極調動群體，「眾志成城」、「擊暴除奸」。這是亡國之憂的情態表現，卻以慣見的寓良言於警戒的語序：「未渴先開井，莫等到大禍臨頭箇陣呀，就魄散魂驚」，力倡猛然醒覺，未雨綢繆。

相近的情感模式，也見於以「愁」為主導情緒，且要愁到極致。〈愁到極地〉是援用招子庸的謳題，招子庸原作是從淪落青樓的妹子指責戀人離散在外貪戀風流，忘了家鄉的妻兒、父母，恰似傳統閨怨，但又多了幾分怨婦更積極率真的控訴和勸誡。然而，舊題換上時代愁緒，控訴的生存處境已是「生民如蟻賤，受人壓制苦過黃蓮」，這是家國人民的整體境遇。

#### 愁到極地

愁到極地，問句蒼天，未開苦口淚漣漣。天呀！做乜我國生民如蟻賤，受人壓制苦過黃蓮。內有野蠻政府把我來欺騙，外有紅鬚綠眼把我亂鞭，受苦重重你話對邊一箇來嗟怨，講俾守舊人知，佢都話你係發癲。不若向住箇輩未死人心勤奉勸。大家發憤呀，奪返呢一箇自由權，光天化日未知何時見。哎！須要打算，民權時在念，大倡改革呀，共享一箇太平年。<sup>48</sup>

然而，「內有野蠻政府」和「外有紅鬚綠眼」的內憂外患，將困境推向嗟怨、發顛之極致。此時粵腔的「愁到極地」，已無轉圜之可能。招子庸舊題的抒情

<sup>47</sup> 《開智錄》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2日），頁7a-7b。

<sup>48</sup> 《開智錄》改良第2期（1900年1月5日），頁6b。

格式是勸誡負心人「掉轉心腸」，新粵謳的情態轉向，則往超越性的「大家發憤呀，奪返呢一箇自由權」，化被動為主動。因而「民權」、「改革」的知識性概念和激進，潛在包裹在一個昂揚轉化的情感模式。愁的原動力，帶來一個自由權的追求和渴望。

以上喚醒國民之聲，勸誡之意，背後乃啟動一種知識視域的探求或整合。尤其前後期雜誌充斥各種維新言論，字裡行間所營造的新語感，很難脫離整體的閱讀脈絡，而忽略敘事主體所回應的公共性情感。而情感的基礎，恰恰來自知識架構，以及時局感受。《開智錄》強調開民智的理念，在閱新聞紙之益，所謂「智者，權也，有一分之智，便有一分之權，我不授人，人難奪我，此天賦固有之自由也。……必使聾者聰而瞽者明，夢者醒而愚者智，方為得法也。然欲達此法之目的，必曰新聞紙。」<sup>49</sup>

開智是天賦人權和自由，鄭貫公進而強調知識經驗的傳遞，需緊扣言說方式的感染力：

政治家之思想，國民之輿論，或賦諸詩章，或詠諸歌曲，上自京師，下而草野，通都劇邑，僻壤窮鄉，人民莫不日手數篇，高聲朗誦如登天之快焉。<sup>50</sup>

爾後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談政治小說熏、浸、刺、提之效用，其實可看做進一步理論化了《開智錄》時期，馮自由和鄭貫公等人強調的知識感染力，以及情感之動員。故《開智錄》強調演說者，自由獨立之動機，進一步闡明：「人類之貴，基於能言，擴張言語之交通，增助文明之進步，其利一也；大聲疾呼，喝破世人之迷夢，高低抑揚，挽回政治之思想，其利二也。」<sup>51</sup> 這類訴諸演說、朗誦的呼籲，形成了開明智背後的抒情導向。故而調

<sup>49</sup> 貫庵：〈論閱新聞紙之益〉，《開智錄》改良第3期（1901年1月20日），頁3b-4a。

<sup>50</sup> 同前註，頁5b。

<sup>51</sup> 馮懋龍自由氏：〈論演說之源流及其與國民之關係〉，《開智錄》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2日），頁6a。

動民間方言語體，粵謳的情態特徵，口語俗諺的直白率真，賦予時局現實、知識經驗「高低抑揚」的情緒表現，儘管不如演說澎湃，卻是值得重估的另一種文化啟蒙形式。

1900年2月梁啟超發表〈少年中國說〉，張揚「少年」論述，進而號召中國少年為「少年中國」而奮鬥。

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sup>52</sup>

回看彼時各種報刊論述的生成環境，梁啟超褒揚的少年，恰似鄭貫公、馮自由等開啟民智的少年者。而這套論述不僅是梁啟超的演說體形式，卻同時在《開智錄》第一期的粵謳裡看到端倪。

無可奈

無可奈，想到痴呆，怎能佢地少年智慧來開？年少力強，都唔識把邦家愛，等到中年白髮又催！自古話後生可畏，都係話佢有點爭心在，競爭向上做箇好人來。今日無數後生盡把天良昧，國亡家破不知哀。若係向住老人叫佢把邦家愛，哎！難過吞海，況且又怕暴官民賊害。想起叫老人辦事呀，不若叫佢再世投胎。<sup>53</sup>

〈無可奈〉的唱詞表面對於少年、老人均難以期待。其以正反的敘述語序，一邊表揚少年「年少力強」，一邊又說「唔識把邦家愛」；一邊說「後生可畏」、「有點爭心在」，一邊又數落「後生盡把天良昧，國亡家破不知哀。」整首粵謳的敘事亮點，本意在揚少抑老，但有恨鐵不成鋼的憂患和遺恨，故老少皆數落。尤其對於老人的不負期待和貶抑，則率真的直斥「叫老人辦事呀，不如叫佢再世投胎」。這些對老人之言論，相較於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表述：「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更顯俚俗亦暢快！

<sup>52</sup>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清議報》第35冊（1900年2月10日）。又見《飲冰室文集之五》（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0年），頁7-12。

<sup>53</sup> 《開智錄》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2日），頁7b。



但以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對比框架觀之，這一系列清朗的明喻和對比：「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直率的拉抬出少年之氣勢。梅家玲認為這是以「人之老少」喻擬「國之老少」，除了高度肯定「少年」的進取前瞻意義，梁是將「發現少年與想像中國，視為互為表裡、互為因果的論述體系」，「少年中國」遂無可避免地要與「老大帝國」產生既糾纏盤結，又頡抗對立的複雜關係。<sup>54</sup>但這套「少年中國說」的論述根源，不乏與日本少年論述間的淵源。梅家玲進一步提醒尤其志賀重昂的少作〈日本少年歌〉、德富蘇峰的〈新日本之青年〉（1885），都提供了晚清留日學人對「少年」的發現與意義重估，藉「少年」以想像「國族」的知識脈絡。彼時《清議報》出現不少以「少年」為筆名的作者群，<sup>55</sup>《開智錄》接續兩期發表的〈真少年說〉、<sup>56</sup>〈老大國少年民〉，<sup>57</sup>延續〈少年中國說〉相似論述氛圍，展開了留日青年對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接受與發揚。這具體說明了，粵謳對維新知識的嫁接，既是建立在流亡日本的維新派的知識領袖之論述，亦受益於彼時日本思想界對歐西政治與社會理論的譯介。

如果喚國民、倡民權是彼時開民智思潮的重心，以馮斯樂、鄭貫公等人跟梁啟超有如師徒般的親近接觸，這些在梁啟超 1902 年創辦《新小說》倡導小說界革命之前的少年中國論述，都是留日青年共享的知識話語與氛圍。而粵謳〈無可奈〉的底蘊，雖接軌少年中國說之知識脈絡，但粵謳諷刺勸誡之意涵，反而更具體表現了馮斯樂〈真少年說〉強調的「真少年」真相：

<sup>54</sup>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漢學研究》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 6 月），頁 249-276。

<sup>55</sup> 同前註，頁 258-260。

<sup>56</sup> 自強：〈真少年說〉，《開智錄》改良第 3 期（1901 年 1 月 20 日），頁 1a-3a。

<sup>57</sup> 貫庵：〈老大國少年民〉，《開智錄》改良第 4 期（1901 年 2 月 3 日），頁 8a-8b。

老者之心既宜少，而少者之心益不可使之老。……老大不必徒傷，少年不必盡美，而最可傷可悲可痛可嘆者，唯心之老大，而可喜可美可壯者，唯心之少年。

傷哉！老大而甘為真老大，少年而不務作真少年也。既老而更作衰頹之想，方少而豫興白頭之歎……嗟嗟世界，黑髮白髮，同為頹然之真老翁矣！勉哉老大！戒哉少年！<sup>58</sup>

在此基礎上，鄭貫公進一步強調：「謂能老我以形骸，不能老我以心志也，可謂能老我以國，不能老我以民也，亦無不可。」換言之，粵謳唱道：「無可奈，想到痴呆，怎能把佢地少年智慧來開？」<sup>59</sup>開智之用心，則在於「少年務作真少年」的急切，同時亦有「老我以心志」、「老我以民」的現實憂慮。要說粵謳是「少年中國」論述的抒情版註解，抑或以說唱文體貼近和承接了時代新興話語，以俗言、諧趣「載道」，走進了粵方言群體的集體家國想像，亦無不可。

《開智錄》第一期的這幾首粵謳率先張揚國民、奴隸、民權、真少年等概念，鋪展憂憤、諷刺、勸誡等情態，調動知識視野，實踐了開辦《開智錄》的籲求基調——「爭自由發言之權」和「鼓盪國民獨立之精神」：

民賊之輩，竟欲以強力壓塞民口，敗壞國民發言之權而奪其幸福，使自由之鐘室啞不能高鳴，良堪痛嘆。僕等久懷慨憤，故於瀛海一隅，合眾志士，興起倡論，以爭自由發言之權，及輸進新思想以鼓盪國民獨立之精神為第一主義。<sup>60</sup>

從「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的脈絡而言，粵謳在《開智錄》的知識論述裡，積極展現其扮演的文體功能。作者的詠歎抒懷、諷刺世弊和開啟民智，都落實為一種情感政治的表現，背後隱然浮現著政治性的主體——「國民」。1900年義和團運動是衝擊政治時局的重大事件，《開智錄》對義和團事件的觀察態

<sup>58</sup> 自強：〈真少年說〉，頁 2b-3a。

<sup>59</sup> 貫庵：〈老大國少年民〉，頁 8b。

<sup>60</sup> 〈開智會錄緣起〉，《開智錄》改良第 1 期（1900 年 12 月 22 日），頁 2b。

度，既有肯定言論，亦有批判、嘲謔之聲。比較特別之處是留日學子對〈義和團有功于中國說〉的主張：

夫義和團豈不知寡不可敵眾，弱不可敵強哉？然出于愛國之心，忍之無可忍，故冒萬死以一敵八，冀國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

使義和團一戰而勝，奏凱而旋，有志者乘其機而導之以國民之義務，奪回自由之民權；扭轉乾坤，開共和之善政，民權獨立，掃專制之頹風，則此際之排外滅洋者為義和團，安知順手傾滿州政府，大倡改革者非義和團耶？

然義和團雖一敗塗地，為人不齒，而亦為中國種，無算之強根，播國民獨立之種子，我中國人其知之否耶？敢以所見，略述一二，而使義和團瞑目于九泉之下，我四萬萬同胞國民知所自任也。

義和團之揭竿起也，雖未達其滅洋之目的，而亦開歷史之輝光。傾此二百餘年根深蔞固野蠻無紀之政府，滅此不可枚舉尸位素食冥頑不靈之滿族，使非天假義和團之手，藉聯合軍之力，而為我國民雪二百餘年之深恨，茁固有民權之萌芽，曷克至此？然義和團之功勳，豈淺淺哉！<sup>61</sup>

鄭貫公支持義和團之邏輯，在於藉義和團之一戰，有導之以國民之義務，奪回自由之民權的機會，進而認為這可以是推翻滿清的力量。儘管最終失敗，亦播獨立之種子，導致聯軍入京，亦有傾倒野蠻政府，雪恨之功勞。換言之，支持義和團，亦是假義和團之手，行革命之行動，藉此強調民權、獨立，乃四萬萬同胞國民的責任。

這固然可解讀為彼時青年學子反帝國主義的愛國思想，<sup>62</sup>但參照《開智錄》內其他關於義和團的敘述，另有〈義和拳序〉以滕王閣序體的駢文，抒發紀敘庚子事變導致的慘狀，以及〈祭剛毅文〉對支持義和團的晚清大臣竭盡嘲

<sup>61</sup> 貫公：〈義和團有功于中國說〉，《開智錄》改良第6期（1901年3月20日），頁2a-3b。

<sup>62</sup> 寧樹藩：〈橫濱《開智錄》評介〉，頁90。

諷挖苦之能事。而粵謳亦不遑多讓，〈剛毅弔李蓮英〉就狀寫這兩位朝中后黨權貴惡勢力。剛毅是清末朝廷主戰的保守派，力挺排外的義和團，辦理各地稅務又徇私牟利成了「搜刮大王」，且是監殺戊戌六君子。李蓮英是慈禧身邊的紅人太監總管，逢迎仗勢，形象極差。事實上，剛毅在八國聯軍入京後病故，李蓮英則死於辛亥年。然而，粵謳卻以剛毅弔李蓮英謳唱，反轉處境，從李入宮後改為李進喜，慈禧賜名蓮英，作者將其名調侃一番，既是嘲笑李蓮英的「途窮日暮」，也不忘攀附二人稱兄道弟的私誼。表面弔念蓮英之死，實際還要李蓮英「口角磨尖為我說機」、「保我長生永不受慘淒」。粵謳專門謳詠史事人物，在鴉片戰爭後並不少見，諸如〈頌林制軍〉、〈顛地鬼〉、〈義律鬼〉都是歌頌林則徐愛國情操，或指控英國煙片煙販、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的洋人。然而，〈剛毅弔李蓮英〉發揮詼諧特點之餘，還多了情境虛擬，重點不在控訴，而是建立狼狽為奸的醜態人物形象，更添戲劇張力。

剛毅弔李蓮英（節錄）

……你叫連英身姓李，只話桃李連香還有喜意。做乜好花唔久就被雪霜欺。今日歲後蒼松亦要共你爭一啖氣，免使道傍苦李咁就賤過沙泥。泉路茫茫你雙眼又近視，奈何橋畔問你向乜誰悽？一朝千古悲無已。途窮日暮怕听箇隻子規啼。未必有箇知交如我剛毅。每懷念及我就禁不住淚珠飛。罷咯，不若當你係我慨祖宗來共你擲紙，等我陰謀不軌仗吓鬼力扶持。你便睇我呢一段心腸唔好亂棄，保我長生永不受慘淒。倘若神鬼不容必要罰我落黃泉地，你便口角磨尖為我說機。你若替我講極都係唔能即是相會日子，須緊記。莫變前生志，若係講到傷人箇兩個字呀，共你生過都係唔遲。<sup>63</sup>

《開智錄》顯然將當時剛毅亡故事件視為粵語書寫的極佳題材。除了粵謳，第三、四期連載南音〈新出龍舟歌剛毅自刎〉，篇幅更長，且側重情節推演，細節更豐滿。端看南音的收束數句：

<sup>63</sup> 《開智錄》改良第5期（1901年3月5日），頁7。

勤王兵士就把頭顱割，祭奠忠良六位前。屍首任他豬狗食，點想豬固唔餐狗亦嫌。諸君仔細思緣故，大抵逆黨奸臣肉總不甜。殺了元兇新政變，真可羨，柴平兼米賤，太平天子萬千年。<sup>64</sup>

趣味依然是嘻笑怒罵裡，寄寓時代心事。整體而言，這些粵謳作者都將義和團傷害，轉化為一種時代情緒的解讀。

粵謳裡的「怨」、「嗟怨」本是抒情特點，燕喜堂編撰的《新解心》就有〈盲怨〉藉盲女痛斥對舊社會的怨恨。然而，整個時代情緒朝「怨錯」發展，《開智錄》作者們推進對現實政治的批判，夾帶的悲憤，呼應著一個轉型時代的集體氛圍。

#### 真正怨錯

真正怨錯，錯在當初，誤聽人言估佢真箇係義和，誰知烏合不過一朝火，虎頭蛇尾惹起呢一段大風波。今日北京城已破，聯軍蜂擁呀，嚇得我好似憨鵝。我見咁樣子情形，就不敢在頤和坐，星夜奔逃受不盡折磨，人話咁多風流還有咁多折墮。哎！真惹禍，此事誰之過？恨只恨都係榮剛端慶呀，賺我跌落呢一道深河！<sup>65</sup>

這首假借慈禧太后之聲腔，敘說其在八國聯軍入京後奔逃的慌亂之情，痛斥盲信義和團之錯，更嘲謔義和團「烏合不過一朝火」、「虎頭蛇尾」。而聯軍進京，慈禧太后表現得「嚇得我好似憨鵝」，連夜奔逃熱河。最後還忍不住仿慈禧自嘲，「人話咁多風流還有咁多折墮」，有多久享樂，就遭多少罪。這類果報觀頗接地氣奚落了清政府對政局推諉、逃避的荒腔走板。粵方言的挖苦，既是口語俗諺，亦特別痛快的將「錯」推給一干當初支持和善後義和團運動的大臣榮祿、剛毅、端郡王載漪、慶王奕劻等人。清廷的荒唐，被包裹在一個「怨錯」的時代感覺。

這裡表現的錯、恨、怨等糾纏情緒是彼時內憂外患、亡國危機下的時代感

<sup>64</sup> 《開智錄》改良第3期（1901年1月20日），頁7。《開智錄》改良第4期（1901年2月3日），頁8。

<sup>65</sup> 《開智錄》改良第2期（1901年1月5日），頁6。

受，焦慮感下的某種俗語體現。「真正怨錯」的情感調動，對照〈義和團有功於中國說〉的救亡圖存意識，可以更清楚看見《開智錄》裡的粵謳以諧趣承接時代的負面情緒，既是投映清末留日學人主體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也是回應了愛國思想裡的情感／情緒政治，指向了政治主體的情感認同，以及人在日本面對各種文學啟蒙思潮、維新知識和話語，留日學人對庚子年以降世局展現的矛盾糾葛的失落和希望。

但晚清時期在境外日本冒現的新粵謳，其表現形式處處緊貼著現實語境。我們再看《開智錄》第二期的粵謳〈無情月〉：

#### 無情月

無情月，照住南樓。月呀！乜我見你光臨就惹起杞憂。人話解憂最好係對月兼攜酒，点估我呢種憂懷愈解愈愁。世道人心未必箇箇皆知透，身居地獄呀，尚且得意優悠。何不想吓甲午爭端臺灣非我有，俄國大連旅順跟住索求，膠州送被他人手。轉眼法人又奪廣州，愈割愈深就割到新安口。九龍英國據作咽喉。野蠻政府尚話佢係真朋友，不知佢地心腸當我係馬牛，壓力兩層問我點樣子能捱受？哎，賤過狗，長倚人臀後。但願同胞發憤呀！誓雪呢一點大恥深仇！<sup>66</sup>

作者藉詠月來控訴中國近代史上割地賠款的種種現況，但押韻的唱歎之間，「賤過狗，長倚人臀後」，一幅清政府仰人鼻息的醜態；「當我係馬牛，壓力兩層」，列強和滿人欺壓，裡外皆奴隸局面，當前局勢跟預設的「國民」知識版圖已躍然紙上，傳播開去。

無獨有偶，第五期刊載〈新春月〉將國民受苦處境進一步放大。

#### 新春月

新春月，照住孤舟，泛在長江任佢去流。月呀，你係容光必照邊箇唔知你恩深厚。但係受苦生民莫甚我亞洲。日本人知唔守舊，維新保國坐享優悠。個的冥頑不變居人後，則有安南高麗與及緬甸琉球，可惜國權盡

<sup>66</sup> 同前註，頁 6a。

在他人手。我嘅堂堂中國同病相憂。我想同胞苦楚，月呀，你亦深知透。

哎！捱到夠，改革何時候？虧我神明種族呀，咁就作馬為牛。<sup>67</sup>

此刻「受苦生民莫甚我亞洲」已是集體際遇，除了明治維新的日本以外，面臨列強覬覦和佔領的其他國度都難逃「國權盡在他人手」。因而抒情的「新春月」照見的是「冥頑不變」的中國。詠月本來就是古典詩詞常見題材，在招子庸的《粵謳》也有好幾首謳題跟詠月相關。<sup>68</sup>這就有理由相信，《開智錄》的〈無情月〉、〈新春月〉有意從舊有謳題裡轉化新意，另啟爐灶。如此一來，改革和國權，並置為一個詠月的內在情感起興元素，由此推導出「咁就作馬為牛」的現實處境，已鑲嵌深沉的無奈與無力感。

整體而言，這些說唱文學積極詠唱維新時代，調動民間形式介入時局的寫作，展露新興知識話語，都屬初萌芽階段。這讓我們進一步探索，口語的敘事或抒情，語序轉換之間對應的現代經驗，彼此交接與交換的是共享的知識視域，以及時代情緒與知識經驗的交織。恰恰是這個迷人的特點，促使我們重新思考，黃遵憲倡導「我手寫我口」，梁啟超鼓吹的詩界革命，新體詩概念下的詩語革新，在粵謳的俗語和民間形式裡，不一定在新辭彙的發明，往往是內嵌的知識與情感結構，已有效的體現其對「『知識』經驗」的接受和轉換。

若對照 1903 年以後《新小說》「雜歌謠」出現的「新粵謳」，論者以為其典型的意義乃呈現了「尚武、英雄作為新國民的前提」、「宣揚立憲、推崇議會，以體現自由民主的價值」的新民精神。<sup>69</sup>諸如〈自由鐘〉、〈趁早乘機〉、〈學界風潮〉、〈鴉片煙〉、〈開民智〉、〈復民權〉等系列作品，都是借舊文體以再現新鮮的現代經驗。這些寫於南美洲古巴的粵謳，乃是 1903 年派駐當地的外交官廖恩燾投寄給梁啟超的作品。姚達兌強調廖恩燾這些帶有剛健、

<sup>67</sup> 《開智錄》改良第五期（1901 年 3 月 5 日），頁 7。

<sup>68</sup> 招子庸《粵謳》裡詠月的謳題有〈多情月〉、〈無情月〉、〈天邊月〉、〈樓頭月〉等。

<sup>69</sup> 趙雨樂：〈粵謳歌頌的清末新民：梁啟超編《新小說·雜歌謠》的幾種觀察〉，《國家建設與地域關懷》（香港：中華書局，2013 年），頁 21-37。

辛辣、豪邁風格的作品，創造了一批可稱為時政謳、啟蒙謳的新粵謳。這類粵謳評驚時事，調動新詞彙，喚醒國民，推動改良維新，呼籲創造新邦國。<sup>70</sup>就政治知識與社會進程而言，在在都可看做從《開智錄》以降延續的知識結構。

這些寫於境外，傳閱與發酵於海外華人社群，進而在中國境內發生意義的粵謳，凸顯了作為離散脈絡意義下的啟蒙寫作的特殊性。這是粵方言的跨境生產，接軌國內外的知識與政治脈動，貼近口語的書面寫作，完整契合「我手寫我口」的言文一致，以及「接地氣」的時代精神。因而這些標榜新思想與新知識的粵謳，其實有著更積極的寫作位置。例如〈自由鐘〉開章就是寓言般的警句：「無乜好贈，贈你一個自由鐘。想你響起鐘嚟叫醒世界上的癡聾。」<sup>71</sup>鐘作為象徵，作為譬喻，無論是況世、喻人、言事和警時，這個時鐘意象顯得自然貼切，輕易接引上自由思想的渴求。然而，整首粵謳卻是直面割地賠款的家國危機時刻，尤其提醒眾人連作夢都要數著時辰鐘數：「你唔睇天色做人，都要按住鐘數嚟發夢」。鐘要報時，自由鐘因此僅是念想和渴求。論者指出這類粵謳「以新器物喻國家大事，使粵謳成了警世之鐘」，<sup>72</sup>提醒我們箇中唱頌的政治議題、文明思考，貼切回應了梁啟超〈新民說〉展現的巨大影響。對照於同屬 1903 年陳天華（1875-1905）發表的〈警世鐘〉長文，同樣用警鐘概念，鏗鏘有力地喚醒國人反帝反清的革命意識。但〈自由鐘〉的小品寫作，粵腔裡的靈動自如，卻賦予「新民」更鮮活的感染力，毫不遜色於陳天華的宣傳革命長文論述。當新民概念的貫徹必須調動粵謳的民間文體形式，帶入報刊的新媒介以達到推廣和傳播之目的，「『知識』經驗」已直接內嵌為粵謳的敘事動力和文體精神。粵謳的詠唱，恰似替新民思想呈現的政治論述。換上新面貌的粵謳，預告了一個帶有諧趣形式的社會改造文體的誕生。

<sup>70</sup> 姚達兌：〈離散、方言與啟蒙：《新小說》雜誌上廖恩燾的新粵謳〉，《中國現代文學》第 31 期（2017 年 6 月），頁 59-74。

<sup>71</sup> 未署名：〈自由鐘〉，《新小說》第 7 號（1903 年 9 月），頁 159-160。

<sup>72</sup> 招子庸等撰，陳寂、陳方評注：〈新粵謳〉，收入《粵謳》（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114-115。



綜觀《開智錄》到《新小說》這兩份期刊對民間韻文體的提倡，不僅是拓寬了晚清詩歌開展的「新體詩」格局，更重要的是帶來了粵語書寫的新局面。粵語書寫兼具半文半白的效果，粵謳尤其具備口語、音樂節奏的唱說型態。這類帶有民間色彩的韻文體寫作，傳播廣，對形塑地域文化與家國認同有積極意義。最初在報刊鼓吹的粵謳、南音，均具備響應時勢，憂國憂民，以及回應、申張報刊言論知識。尤其保皇與革命兩大陣營之間各有自己的發聲園地，粵謳也因此成了各自陣營善用調度的新文體。

### 三、粵謳與華人世界

粵方言書面化配合知識經驗的傳播，尤其是粵謳、粵語格律詩的寫作，擴及於港澳、新馬，甚至美洲、澳洲華人地區，對國家、鄉土、身分觀念都帶來影響。這不僅限於一時一地的地方文化，透過移民、報刊傳播媒介的普及，而放大為語言與社會身分的連結。

保皇黨主要崛起於海外華人社會，《開智錄》的發行網絡也受惠於《清議報》的普及。其中馮自由《革命逸史》提到《開智錄》於海外華僑的影響：「各地華僑以其文字淺顯、立論新奇，多歡迎之，尤其南洋群島為最。」<sup>73</sup>事實上，粵謳的傳播隨著廣東移民群體的遷徙而流動，不僅在南洋社會，澳洲、加拿大的華人移民社群都可見到粵謳的蹤跡。箇中緣由，大概不出邱菽園的觀察：

近來志士遠追金元，旁效歐美，有取夫謳歌變俗之義。無論日報旬報，皆有歌謠一門，而粵謳尤多，則以粵人多任報中記者之故耳。<sup>74</sup>

二十世紀初期澳洲華僑社會的東華新報（The Tung Wah Times，1901-1936）就有代售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創辦的各類刊物，包括《國民報》、《譯書彙編》，以及《開智錄》。1900年底至1901年4月人在澳洲的梁啟超，應在箇中扮演

<sup>73</sup> 馮自由：〈革命逸史：橫濱開智錄〉，頁32。

<sup>74</sup> 菽園：〈招子庸粵謳〉，《振南報》（1914年6月22日），「彙文·藝文談」，第9頁。

了推廣之角色。其中針對《開智錄》的代售廣告如此描述：「此書為橫濱開智會之會報，議論精新，翻譯明晰，上中下三等人皆合觀看，誠開民智慧之佳本也。……其中小說、笑談、南音三類尤其動目。」<sup>75</sup>《東華新報》是保皇會的喉舌，橫濱、東京創辦的維新派啟蒙雜誌、書籍透過維新人士的到訪而拓展其受眾群體，尤其梁啟超還是最早到澳洲的中華名人，在移民社群裡自然有不同的意義。雖此行籌措保皇會經費遭遇困難，但梁啟超意識到激勵華僑愛國心的重要。<sup>76</sup>梁的官話帶廣東腔，其推動《新小說》刊載粵謳等粵語書寫文本，亦能看出他的廣東人意識在團結、培養華僑愛國心的原動力。論者以為梁啟超清楚展現了清末廣東人的鄉土意識與中國意識之間的相互關聯，粵語所連結的，即是鄉土。<sup>77</sup>因而《開智錄》在澳洲代售，透過啟蒙讀物帶動粵謳、南音的傳播，粵語文本在華僑社會帶動的鄉土意識，其中蘊含開智、新知的功能已不言而喻。

加拿大歷史最悠久的華文報刊要屬《大漢公報》（1909-1992），其文學版面「大漢雜錄」和二十年後改名的「漢聲」，常刊載嶺南色彩的班本、粵謳、諧文、滑稽談、諧詩、木魚、南音等文學作品，夾雜方言。加拿大華人文學的起點最初是保皇黨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帶動的辦報風潮。梁啟超在溫哥華創辦第一份華文報刊《日新報》。爾後由溫哥華的美亞美牧師信徒，出資創立了《華英日報》，後續輾轉賣給了洪門，先後改名《大漢日報》和《大漢公報》。<sup>78</sup>1909年第一任主編就是馮自由。新粵謳的形式，改變和重新組合了異地華人社會裡藉粵謳歌詠的對象和語境。彼時《大漢公報》既有刊載謳歌中國五四運動局勢裡被拘禁的學生：

<sup>75</sup> 〈代售開智錄〉，《東華新報》（The Tung Wah News）（1901年2月9日），頁3。

<sup>76</sup> （日）狹間直樹著，高瑩瑩譯：《梁啟超：東亞文明史的轉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頁69-72。

<sup>77</sup> （日）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臺北：群學出版社，2020年），頁125-129。

<sup>78</sup> 參見梁麗芳：〈試論嶺南人對加拿大華文文學的起源及形成的貢獻〉，《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3期（2010年3月），頁3-8。

## 爭啖氣

爭啖氣，哭一句同人，你為愛國情深，拼不愛身。今日咁樣子情形，邊一個唔動公憤。……唉，須發奮，大眾都得忍。邊個係賣國元兇喇，要將佢化骨揚灰，變作纖塵。

亦能看到〈汝去跳舞〉這類粵謳表現在西方社會裡融入女權和女性意識解放，追求自由的思潮痕跡。

## 汝去跳舞

嬌呀，汝去跳舞，即管跟嚟，風流快活，怕乜學吓老西。呢陣解放自由，就唔好被禮教制。后生男女，可以亂做胡為。有暇唔去尋歡，枉生一世，跳跳慣左，又可以暫作夫妻，只要我地情癡，自然就有翳肺。唉，唔駛計，人言何足畏，遇著父兄督責咯，嬌呀，汝最好當作渠狗吠雞啼。<sup>79</sup>

作者以粵謳的諧趣和諷刺基調，展露了加拿大華人在鄉土經驗與身分追尋脈絡裡的轉變。這揭示了離散華人文化元素在粵謳的實踐，亦是進一步從新粵謳常見的政治批評裡，導入了西方語境內個體自由與性別意識。

同屬《開智錄》的編輯班底，馮自由到加拿大辦報，鄭貫公則到香港任職《中國日報》（1900-1913）、《中國旬報》（1900-1901），以及1905年創辦《唯一趣報有所謂》，都可看到粵語書寫的各類文體在報刊刊載。同屬1905年醞釀形成的反美禁約運動，在中國眾多城市展開，同時擴及港澳、東南亞、美洲地區。在抵制美貨期間，廣州、澳門的各類演講場合，既可見粵語演說，也不乏藉由木魚、龍舟歌、粵謳、南音的演出，以生動語言吸引群眾，尤其帶動婦女與會，<sup>80</sup>將抵制運動的資訊和精神導入民間。這項聲援旅美華工、華人的運動，在鄭貫公主導的《唯一趣報有所謂》留下不少以此為題材的粵謳作品，粵謳因而打開了一

<sup>79</sup> 〈爭啖氣〉刊載於《大漢公報》（1919年8月25日）、〈汝去跳舞〉刊載於《大漢公報》（1925年10月5日）。轉引自梁麗芳、馬佳主編：《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加拿大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5年），頁3-8。

<sup>80</sup> 黃賢強：《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中國城市抗爭的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頁108。

個介入美國離散華人議題的面向，在華人權益、種族關係、離散際遇裡，充分實踐了粵謳跨地域共享「此時此地」經驗的精神特質。換言之，在反帝國主義、關懷旅美華工命運的基礎上，中國以及境外各地華人都團結在抵制運動的陣線上，粵語演說和書寫構成了一種集體氛圍，粵謳在此際有其不可忽視的意義。如同李婉薇的判斷，《唯一趣報有所謂》「與廣州社會，以至整個時代同呼同吸」。<sup>81</sup>

根據李婉薇的進一步觀察，香港、廣東在 1903-1907 年間創辦的幾份報刊的編輯班底接近，基本設置諧文歌謠欄目，成了一個粵語寫作群體，構成晚清粵語寫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這些粵語寫作「有時甚至逸出政治宣傳的需要，而滿足他們作為下層文人的寫作旨趣」。<sup>82</sup>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這樣的寫作群體同時擴及其他國度的廣東移民社群。20 世紀前 20 年創辦的各地華文報刊，在競爭激烈，爭取讀者的需求下，報刊設置欄目相互仿照，在傳遞訊息之餘，增加不同欄目符合各類讀者之需求。<sup>83</sup> 而粵語書寫的粵謳、南音、龍舟等韻文體歌謠的刊載，在政治宣傳之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體與當地社會民情、風土脈動的聯繫。

十九世紀末在廣東地區流行的粵謳，這種民間歌謠形式隨著文化人的遷徙，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成為新馬報刊頗具活力的粵語書寫。<sup>84</sup> 有趣的是，同時

<sup>81</sup> 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頁 78-79。關於反美抗約的粵謳作品，可參見阿英編：《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677-683。冼玉清：〈一九〇五年反美愛國運動與「粵謳」：紀念廣東人民反美拒約運動六十週年〉，《冼玉清論著彙編》（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613-688。

<sup>82</sup> 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頁 130-131。

<sup>83</sup> 關於晚清民國時期華文報紙和副刊的經營和傳播，參見楊昌年：〈中國文學在新馬的傳播：回顧與前瞻〉。該文發表於 2003/11/22-23 吉隆坡馬華公會大廈「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百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網上瀏覽 <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Taiwan/yang-s/yang-s-06.htm>（2021/2/18 瀏覽）。

<sup>84</sup> 李慶年的《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是最初討論南洋粵謳的學術專著。爾後接續編輯的《馬來亞粵謳大全》，集中在報刊資料的收集，貢獻甚大。參見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李慶年編：《馬來亞粵謳大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 年）。目前相關專著另有李成鋼：《廿世紀初馬來亞粵謳研究 1904-1920》（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碩士論文，2012 年，郭淑雲先生指導）。

在新馬報刊登場的粵謳，題材涉及移民社會的勞動階層體驗，亦涉及保皇、革命的家國想像。尤其新馬報刊登載粵謳有近 40 年的歷史，結束於二戰期間新馬淪陷之前。時間相對長的南洋華人的粵謳創作、轉載和閱讀過程，我們如何看待粵語書寫跨境出洋，在異地廣府華人社群傳播的意義？華人透過粵謳響應中原時勢的更迭發展，亦改造粵謳介入當地生存感受。數量龐大的粵謳流通於當地報刊，在馬華文學的民間文學與傳統文學類型裡，實屬罕見。從粵語書寫或方言文學的角度而言，粵謳引導了我們思辨華人世界的文化與精神內涵。

粵謳以口語見長，生動靈活，直接觸動現實經驗。粵謳在橫濱維新派士人創辦的《開智錄》、《新小說》裡冒現，在晚清之際風行，大有取民間形式，擔負啟迪民智的功能，直指家國啟蒙議題，文辭洗脫俚俗，展現新民效果。然而，這些新粵謳的作法，在新馬地域卻有另一更普遍的面貌——介入華人移民和殖民地經驗，展現離散華人群體的精神狀態與生存體驗。1901 年 1 月 25 日《天南新報》（1898-1905）刊登了新馬報刊上最早的粵謳〈粵謳解心〉、〈憂到冇了〉。<sup>85</sup> 然而，這兩首粵謳卻是轉引自《開智錄》第一期改良版。從福建移居新加坡的傳統文人邱菽園，大概是最早在新馬推動粵謳的關鍵人物。他辦報、辦學，以及跨國境廣泛的文人交遊，成了倡導粵謳的一個重要機緣。1898 年 5 月，邱菽園仿晚清士人辦報議政和開啟民智的精神，創立《天南新報》。其時，他對粵謳的認知和推動，始於創立麗澤社公開徵求「粵謳題」，雖則來稿寥寥，卻反映了他最初對民間韻語、歌謠之倡導，跟清末黃遵憲、梁啟超等人基本同一步調。他跟維新人士交際密切，受彼時文學變革和維新救國之思潮影響，自然不言而喻。他在著述裡多次考究粵謳源流，跟他「幼長於粵屬，能操粵語，為粵談」不無關係。<sup>86</sup> 但值得關注的文學跨境交際與傳播，當屬《清

<sup>85</sup> 參見李慶年編：《馬來亞粵謳大全》，頁 31。根據內文參照比較，〈粵謳解心〉就是《開智錄》裡的〈心點樣解〉。

<sup>86</sup> 關於邱菽園著述裡對粵謳之考證和倡導，見拙作：《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 年），頁 420-422。

議報》的「詩文辭隨錄」從 1899 年 7 月至 1901 年 9 月間，相當密集刊載了邱菽園詩作，以及眾人環繞邱菽園〈風月琴尊圖〉的集體題詠。而 1900 年邱菽園還接應康有為到新加坡避難，捐助庚子勤王運動，擔任保皇會新加坡分會會長。他在政治上響應維新派，在《開智錄》裡亦有脈動。除了刊載他的文章，時人題贈給這位星洲寓公的詩作，既看出他跟維新士人的交際互動，也能推敲彼此共享的維新話語和知識脈絡。當時馮自由題贈星洲寓公的詩作，分享了其倡導自由、獨立、民權之觀念：

贈星洲寓公 自由

文明地獄野蠻天，二十世紀初即有義和團之事，聯軍劫掠，慘無天日，不知人道之謂何矣廿紀修羅鐵血鮮梵語有云修羅場。傀儡爭存魔鬼現，喇叭吹起睡獅眠。自由潮汐新中國，獨立風雲壯少年。絕好黃金供鍛冶西儒有謂世界為黃金世界者，與君擊劍唱民權。<sup>87</sup>

由此可見，邱菽園為南洋開啟的新粵謳起點，可以視為《開智錄》以粵謳開民智的傳播結果。然而，1901 年 11 月邱菽園因福建海澄家人受清廷要脅，被迫疏離維新派士人，退出了《天南新報》。因此，直到 1904 年始有粵謳再次出現於該報。不過，晚清嶺南的著名報人與小說家黃伯耀、黃世仲兄弟於 1893 年到南洋發展，黃世仲在 1902 年加入《天南新報》擔任主筆，直到 1903 年回到香港。其兄黃伯耀接續其職位，繼任主筆一職。爾後黃伯耀在 1904 年又轉任《圖南日報》（1904-1905）主筆。<sup>88</sup> 如此看來，粵籍報人和文人持續進駐星洲，為新加坡最初的文學發展環境，開啟了一個粵謳為觀察的視點。

邱菽園有報人身分，自當知曉粵謳跟報刊關係的特殊脈絡。他所謂「無論日報、旬報，皆有歌謠一門，而粵謳尤多，則以粵人多任報中記者之故耳。」<sup>89</sup> 這不僅描述了粵謳盛行於清末粵港的情況，也連帶提醒了我們注意他曾關注粵

<sup>87</sup> 自由：〈寄贈星洲寓公〉，《開智錄》改良第 2 期（1901 年 1 月 5 日），頁 1a。

<sup>88</sup> 他們於南洋的相關背景，參閱申良友編著：《報王黃世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11。

<sup>89</sup> 菽園：〈招子庸粵謳〉，《振南報》（1914 年 6 月 22 日），「彙文·藝文談」，第 9 頁。

人在橫濱創辦《開智錄》、《新小說》的經過，因而「謳歌變俗」的其中一個面向，既是報刊雜誌開啟新粵謳的先聲，也是間接回應了 1905 年以後，新馬兩地至少 13 家報紙皆有刊載粵謳的事實。在 1920 年代馬華新文學蓬勃發展以前，粵謳作為民俗歌謠、韻文體有其扎根的現實語境，尤其不能忽略的是，粵謳到底有其曲藝形式，盲妹、瞽師在酒樓、妓院、街市演唱粵謳，也是 19 世紀末的新馬城市文化生態。<sup>90</sup> 而報刊裡登載的書面粵謳，不但作者群較為龐雜，其粵謳形式和知識經驗跟彼時已在粵港蓬勃登載的新粵謳，共享著接近的知識經驗。這對新馬粵謳的發展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新馬華人輿論透過報刊回應維新變法、革命反滿等政治思潮，粵謳自然也有其現實的「家國」想像和投映，以及華人移民底層和勞動社會的生活觀察。

受到彼時新粵謳形式的影響，新馬粵謳深入華人生活裡的鴉片、賭博、迷信、纏足、八股、嫖妓等議題，描繪的是當地社會現象與新聞，但背後仍響應和傳播其時知識界流通的維新與新民思潮。這兩者構成了一個知識層的文明觀，與勞動群體的生活觀，在粵語的書面形式，找到了一個融合並置的平台。這是南洋華人的現代經驗，寄存於粵音的語言形式，碰撞出一個帶有活力和生命力的華人世界的投映。粵謳在廣府人作為第二大方言群的新加坡受到歡迎，<sup>91</sup> 同時提示了在白話文書面系統未建立以前，一個最接近生存型態的知識結構。中國南來移民在英殖民地組成的華人社會，常見的族群矛盾和生存困境，往往表現在帶有民族主義心態的自我觀照和投射。諸如〈架厘飯〉這首粵謳，調動南洋咖哩的在地飲食符號，討論的卻是黃種人跟白種人在這片土地上的種族糾葛。

<sup>90</sup> 李慶年指出，從 1901-1939 年間收集到的 13 家新馬報刊粵謳，就有 1420 首。此龐大數量足以看出新馬粵謳的蓬勃，以及廣府社群對粵謳書寫的參與與接受。關於新馬粵謳在各報刊登載的情況，參見李慶年：〈馬來亞粵謳的起源與概況〉，收入李慶年編：《馬來亞粵謳大全》，頁 1-29。

<sup>91</sup> 根據麥留芳提供的數據觀察，從 1891-1941 年廣府人在檳城與新加坡都是第二大方言群。而最大宗的方言群始終是福建人。參見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 年），頁 70。

架厘飯，撈起在盤間，愁人睇見不覺頓開顏！今日廿世紀風潮如此浩漫，豈敢話食餐洋菜咁就解卻了心煩。但係我別有一種感情生着眼，等我與君談吓願你地莫當為閒！都只為天演競爭真正係可歎，白憂黃禍久已播在人寰。或者世界將來如此飯，我地黃人勢大不久就會把佢个的白種淘刪。唔信你睇吓熱氣蒸騰堆滿白粳，結成團體積如山，一落架厘將佢攪反，欲想變翻原色咁就十二分難，故此我睹物思人增浩歎！唉，心想爛，前程何可限，但愿我地同胞齊發奮呀，怕乜佢白種咁摧殘！<sup>92</sup>

作者以貼近地方風土和生活習俗的「架厘飯」為意象，表面討論「白憂黃禍」，實際上是殖民地華人底層移民的生存壓力的寓意化呈現。因此對黃種人的期許，竟希冀有朝一日如咖哩飯的攪反，白飯染黃再也不復還原。這是極其傳神的譬喻，藉日常飲食調動族群想像，訴諸華人移民群體的召喚。作者顯然受新粵謳影響，表徵現實生存狀態，內在實已鑲嵌「天演競爭」、「同胞齊發奮」等國民爭平權、爭自由的潛在知識構想。

粵謳流行於新馬在二戰淪陷前的報刊，在南來文學主流的新文學之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真實接近華人移民生活的生存情境和日常經驗。從清末的戒賭、戒煙、戒嫖等勸善的現實呼籲，維新與革命立場對中國政局的針貶和嘲諷，殖民地生存環境與民生問題，都在粵謳反映的「經驗」結構中，表現出華人移民的所學所知，也包含自我的態度、意志與價值取捨。

#### 四、小 結

本文探究清末新粵謳勾勒與承載的維新視域，其背後的知識結構。這樣的知識系統，透過口語俗諺有效構成或傳遞一套知識經驗，連接於這些維新報人與創作者的時代思維和感知視域。粵謳扮演的功能和角色，除了政治批評、宣傳，其傳遞知識經驗，發揮著充滿感染力的情態功能，甚至形塑一種情感意

<sup>92</sup> 笑罕：〈架厘飯〉，《天南新報》（1904年1月20日），頁1a。又見李慶年編：《馬來亞粵謳大全》，頁35。



義上的國民論述。在一定程度上，粵謳表現了知識傳播者藉由共同對時局的憂患，轉換成粵謳固有民間說唱、歌謠所具備的教化、勸戒、諷刺、詼諧特徵，體現為知識人的情感政治。其中《開智錄》的政治論述、時事評論、新聞譯述所呈現的知識話語，恰恰是影響粵語文本生產，以及過渡其知識經驗的重要環節。而粵謳的創作，其新穎處還展現在對招子庸《粵謳》的舊題新唱，謳詠的內容精神已是新視域的翻轉，對形塑國民認知、現實批判、國際眼界、民權自由有著更積極的影響。

對於期刊雜誌的發行體系而言，粵謳等民間文體的帶入，其傳播與造成的影響，可視為粵方言群接軌新知識、新感受，以及對時局情感的共鳴。尤其粵謳朝向維新思潮的文體發展路線，攸關預設的讀者，間接形塑了地域性文化認同。無論是革命或維新立場，隨著文人、報人的移動，革命與保皇陣營對報刊資源的調度，相關的政體、民權、文明、地理知識和概念，透過粵謳、南音等韻文體傳播，凸顯的是粵港地方性知識版圖的擴大。這也是清末新粵謳興起後的效應，值得重視。

從《開智錄》僅有的數首粵謳所開展的新局來看，儘管不如廖恩燾在《新小說》系列粵謳寫作影響來得大，但不能忽視的是，日本橫濱作為刊物的發行地，留日學生群體內部對粵語書寫的關注和投入，已是一個晚清新知和民間文體寫作交織共享的現場。如此看來，《開智錄》登載粵謳開啟的粵語寫作意義，體現了維新時代對知識傳播的粵語政治。

與此同時，《開智錄》間接開啟了新粵謳型態在南洋最初的登載，見證了粵語書寫的跨境傳釋，以及文人的流動經驗。更為關鍵的是，粵謳在勞動階層為主體的南洋移民社會，訴諸「聲音」的傳播和魅力，那是介入殖民地和中國時局變遷的「聲音」，也是各派華人政治立場的「異聲」，更屬於遊走於華人移民底層的聲貌描繪。換言之，粵謳不僅被視為民間韻文體的通俗類型，同時體現了華人社會內部的粵語政治。

（責任校對：王誠御）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未署名：〈代售開智錄〉，《東華新報》（The Tung Wah News）（1901年2月9日）。
- 未署名：〈自由鐘〉，《新小說》第7號（1903年9月）。
- \* 未署名：〈開智會錄緣起〉，《開智錄》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2日）。
- 未署名：〈說國民〉，《國民報》第1卷第2期（1901年2月）。
- 自由：〈寄贈星洲寓公〉，《開智錄》改良第2期（1901年1月5日）。
- 自強：〈真少年說〉，《開智錄》改良第3期（1901年1月20日）。
- 邱煒菱：《揮塵拾遺》，上海：星洲觀演齋叢書，1901年。
- 哀時客：〈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之前途〉，《清議報》第30期（1899年10月15日）。
- 晉陽先生撰：《再粵謳》（清道光十年廣州蘭經堂刻本），收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海外廣東珍本文獻叢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輯第37冊。
- 招子庸等撰，陳寂、陳方評注：《粵謳》，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
- 笑罕：〈架厘飯〉，《天南新報》（1904年1月20日）。
- 康有為：〈請開學校折〉，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上冊。
-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清議報》第35冊（1900年2月10日）。又見《飲冰室文集之五》，臺北：中華書局，1960年。
- 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100冊（1901年12月22日）。
- 梁啟超：〈論幼學〉，《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冊。

- 貫 公：〈拒約必須急設機關日報〉，《唯一趣報有所謂》（1905年8月18日）。
- 貫 公：〈開智社有所謂出世之使聲〉，《唯一趣報有所謂》（1905年6月4日）。
- 貫 公：〈義和團有功於中國說〉，《開智錄》改良第6期（1901年3月20日）。
- 貫 庵：〈論閱新聞紙之益〉，《開智錄》改良第3期（1901年1月20日）。
- 菽 園：〈招子庸粵謳〉，《振南報》（1914年6月22日），「彙文·藝文談」。
- 馮自由：〈革命逸史：鄭貫公事略〉，《逸經》第25期（1937年3月）。
- 馮自由：〈革命逸史：橫濱大同學校〉，《逸經》第3期（1936年4月）。
- 馮自由：〈革命逸史：橫濱開智錄〉，《逸經》第6期（1936年5月）。
- 馮自由：〈蘇曼殊之真面目〉，《革命逸史（初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39年。
- \* 馮懋龍自由氏：〈論演說之源流及其與國民之關係〉，《開智錄》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2日）。
- 黃遵憲：〈致梁啟超函〉，陳錚編：《黃遵憲全集（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傷心人（麥孟華）：〈說奴隸〉，《清議報》第69期（1901年1月11日）。
- 楚 卿：〈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新小說》第7號（1903年9月）。
- 廖鳳舒：《新粵謳解心》，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1年。
- 奮翮生：〈開智會序〉，《開智錄》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2日）。
- 簡又文：〈馮自由易名之由來〉，收入簡又文等著：《《逸經》文史集粹》，臺北：新銳文創，2021年。
- （日）大井憲太郎著，馮懋龍自由氏譯述：〈自由略論〉，《開智錄》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2日）。

## 二、近人論著

- 方維規：〈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及相關核心概念通考：兼釋「中國」與民族主義論爭〉，收入孫江、陳力衛主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2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 史峻：〈清末的中日合作：日本橫濱大同學校為研究對象〉，收入江寶釵、王德威主編：《第11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論文集：域外經驗與中國文學史的重構》，臺北：文水出版社，2017年。
- 申良友編著：《報王黃世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
- 朱少璋：〈鳩舌蠻音話粵謳〉，朱少璋編校：《粵謳采輯》，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
- 吳盛青、高嘉謙：〈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一個視域的形構〉，《揚子江評論》2011年第5期。
- 李成鋼：《廿世紀初馬來亞粵謳研究 1904-1920》，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碩士論文，2012年，郭淑雲先生指導。
- \* 李婉薇：《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修訂版）》，香港：三聯書店，2017年。
-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 李慶年編：《馬來亞粵謳大全》，新加坡：今古書畫店，2012年。
- \* 沈松橋：〈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第4分（2002年12月）。DOI:10.6355/BIHPAS.200212.0685
- 冼玉清：〈一九〇五年反美愛國運動與「粵謳」：紀念廣東人民反美拒約運動六十週年〉，《冼玉清論著彙編》，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 \* 冼玉清：〈粵謳與晚清政治〉，《冼玉清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
- 周佳榮：《瀛洲華聲：日本中文報刊一百五十年史》，香港：三聯書店，

2020年。

- 阿英編：《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姚達兌：〈《粵謳》的英譯、接受和敘事〉，《文化遺產》2011年第3期。
- \* 姚達兌：〈離散、方言與啟蒙：《新小說》雜誌上廖恩燾的新粵謳〉，《中國現代文學》第31期（2017年6月），頁59-74。
- \*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
- 梁麗芳、馬佳主編：《中外文學交流史：中國—加拿大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5年。
- 梁麗芳：〈試論嶺南人對加拿大華文文學的起源及形成的貢獻〉，《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3期（2010年3月）。
- 梁鑒江：〈論招子庸的《粵謳》〉，收入紀德君、曾大興主編：《廣府文化》第2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年。
-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6月）。
- 陳方：〈論「新粵謳」〉，《周口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19卷第1期（2002年1月）。
- 陳海懿、張雅婷：《孫中山與馮自由》，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
- 陳寂：〈前言〉，收入招子庸著，陳寂評注：《粵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
-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年。
- 黃賢強：《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中國城市抗爭的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 楊昌年：〈中國文學在新馬的傳播：回顧與前瞻〉，發表於「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百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吉隆坡馬華公會大廈，2003年11月22-23日。網上瀏覽：<http://www.fgu.edu.tw/~wclrc/drafts/>

Taiwan/yang-s/yang-s-06.htm (2021年2月18日)。

楊國雄：〈鄭貫公：英年早逝的革命報人〉，《香港戰前報業》，香港：三聯書店，2013年。

寧樹藩、陳匡時：〈評《開智錄》〉，《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3期。

寧樹藩：〈橫濱《開智錄》評介〉，《新聞大學》1984年第1期。

趙雨樂：〈粵謳歌頌的清末新民：梁啟超編《新小說·雜歌謠》的幾種觀察〉，《國家建設與地域關懷》，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

潘光哲：〈從「新名詞」到「關鍵詞」專輯引言〉，《東亞觀念史集刊》第2期（2021年6月）。

鄧小琴：《粵方言書面化及其歷史演變研究》，南京：南京大學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博士論文，2011年，顧黔先生指導。

\* 韓清安：《橫濱中華街（1894-1972）：一個華人社區的興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

\* (日) 狹間直樹著，高瑩瑩譯：《梁啟超：東亞文明史的轉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

(日) 齋藤希史著，盛浩偉譯：《「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臺北：群學出版社，2020年。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著，甘會斌譯：《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

Fabrice Teroni, "In Pursuit of Emotional Modes: The Philosophy of Emotion after James," in Alix Cohen & Robert Stern, eds., *Thinking about the emotions: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91-31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Anonymous. (1900). Kaizhi hui lu yuanqi [The origins of the *The Wisdom Guide* magazine]. *Kaizhi lu* [*The Wisdom Guide* magazine]. Improved edition, 1, 2-3.
- Han, E.-C. (2021). *Hengbing zhonghua jie (1894-1972): Yige huaren shequ de xingqi* [Rise of a Japanese Chinatown: Yokohama, 1894-1972].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Feng, M.-L. (1900). Lun yanshuo zhi yuanliu ji qi yu guomin zhi guanxi [On the origins of speech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In *Kaizhi lu* [Kaizhi Magazine]. Improved Edition, vol. 1 (December 22, 1900), pp. 3-6.
- Hazama, N. (2021). *Liang Qichao: Dongya wenming shi de zhuanhuan* [Liang Qichao: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Ko, Ch.-C. (2016). *Yimin, jiangjie yu xiandai xing: Hanshi de nanfang lisan yu shuqing (1895-1945)* [Loyalists, boundary and modernity: Southbound diaspora and lyricism of Chinese poetry (1895-1945)].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 Li, Q.-N. (Ed.). (2012). *Malaiya Yueou daqua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Malaya Yue'ou]. Singapore: Jinggu Bookstore.
- Li, W.-W. (2017). *Qingmo Minchu de yueyu shuxie* [The written use of Cantonese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Revised edition).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Shen, S.-Q. (2002). Guoquan yu minquan: Wanqing de "guomin" lunshu, 1895-1911 [National power and people's rights: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ity" in late Qing, 1895-1911].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73 (4), 685-734.
- Xian, Y.-Q. (1995). Yueou yu wanqing zhengzhi [Yueou and the late Qing politics]. In *Xian Yuqing wenji* [Collected works of Xian Yuqing] (pp. 287-382).

---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Yao, D.-D. (2017). Lisan, fangyan yu qimeng: "Xin xiaoshuo" zazhi shang Liao Entao de xin yueou [Diaspora, dialect, and enlightenment: Liao Entao's new yue'ou in "New fiction" magazin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31, 59-74.



# 臺大中文學報

(第八十期抽印本)

## 《開智錄》與粵語書寫： 維新時代的粵謳形式與知識經驗

高 嘉 謙 著

臺灣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印行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三月出版